

生者何为？

——从“荒诞意识”出发看加缪的“荒诞系列”作品

张 博

摘 要: 从创作伊始,加缪便将“荒诞意识”视为一个起点。由此出发,加缪通过其一系列创作,努力回答“生者何为”的问题,探索拥有“荒诞意识”的人究竟怎样才能在这荒诞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并最终重塑生活。这一系列思路,在他早年的“荒诞系列”中便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通过《局外人》与《卡利古拉》,加缪分别描绘了“荒诞意识”可能导致的虚无与专制,而在《死之幸福》与《西西弗斯神话》中,“荒诞意识”则通向自我对人间幸福的追寻。本文的目的即在于细致分析加缪的这一创作线索,继而展现加缪早期作品中所蕴含的振奋人心的文字力量以及他对人间与人类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 加缪; 荒诞; 荒诞意识; 人间幸福

作者简介: 张博,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vladimirzhang@gmail.com

Title: More Than Being Alive: On Albert Camus' Works of Absurd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Absurdity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his writing career, Albert Camus had taken “the consciousness of absurd” as his fundamental guideline. Through a series of works, he explored how human-being with that consciousness lived in the absurd world and how they tried to redefine their meaning of life with their own forces. In *L'Étranger* and *Caligula*, Camus portrayed a picture of nihilism and despotism resulte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absurdity, while in *La Mort heureuse* and *Le mythe de Sisyphe* the same consciousness had led to the pursuit for happiness in the human world. This essay charts the trajectory of Camus' creative guideline and exposed the enlightening power and his sympathy towards mankind in his early works.

Keywords: Albert Camus; absurdity; consciousness of absurdity; worldly happiness

Author: Zhang Bo is a Ph. D. of French literature in University of Paris IV (Paris 75004, France), with research focus on the 20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Email: vladimirzhang@gmail.com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绝不可能是
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加
缪(OCI 795)^①

1943年,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名篇《〈局外人〉之阐释》一文中提到,“荒诞”一词“在加缪笔下有两个差异极大的意义:荒诞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某些人对这一状态的清醒意识”(Sartre, “Explication” 93)。萨特的分析包含着洞见。而为了进一步区分,在本文中笔者将把荒

诞的事实状态统称为“荒诞”,而把对这一事实状态产生的意识称为“荒诞意识”。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

有的时候,生存的背景会突然崩塌。
起床,电车,四小时呆在办公室或工厂,吃
饭,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
二三四五六,尽管总是相同的节奏,但这
却是一条在大部分时间中很容易沿着走
的线路。但一旦某一天,“为什么”这三

个字在心中升起,一切就都在这略带震惊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本身非常重要。厌倦,它本处于机械生活的最后一幕,却同时为意识活动拉开了序幕。它唤醒了意识并激发起后续的行为。所谓后续的行为,不是无意识地重新回到枷锁之中,就是最终的觉醒。(OCI 227-28)

机械的生活可被称为“荒诞”,“为什么”三个字则成为“荒诞意识”的开始,而它所唤醒的意识与激起的后续行为,便构成了加缪真正关注的焦点。^②1938年10月20日,年仅二十五岁的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书评专栏中对比他年长八岁的萨特的新作《恶心》做出点评,他写道: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有趣的并非这一发现本身,而是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以及行动的准则。(OCI 795-96)

1938年的加缪尚未写出他的“荒诞三部曲”(《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斯神话》)中的任何一部,也未曾走访过巴黎,与萨特这位他日后的密友与仇敌尚不相识,只有《死之幸福》在他的草稿中逐渐孕育成形。加缪作为一个法国海外殖民地首都的记者,能在第一时间对《恶心》做出回应,充分说明加缪本人对“荒诞”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他的这段话不仅是对萨特著作的评论,也暗含着他自己创作的起点。年轻的加缪在对《恶心》表达了有节制的赞赏之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一直走到底”(OCI 796)?他隐忍地质疑萨特为何从荒诞出发又回到荒诞,而没有接着展开新的行动。在加缪看来,最重要的是从对“荒诞”的认知出发去寻觅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与态度。日后在散文《谜语》中,加缪再次确证“荒诞只能被认作某种出发的姿态,哪怕说对它的记忆对与它的情感伴随着今后的每个步骤”(OCI 605)。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加缪真正关心的问题并非“荒诞是什么”,而是“生者何为”,是在拥有“荒诞意识”之后人类如何生存。所以对于加缪来说,核心问题并非“荒诞”,而是“荒诞意识”以及由该意识所导致的后续行动。他也正是由此

开始展开了他对于人类生存的追问与探索。

“荒诞意识”的两幅面孔

作为“荒诞系列”的代表作,《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从小说开篇起,便是一个已经拥有“荒诞意识”的人,加缪没有花费任何篇幅去解释他为何产生“荒诞意识”,他直接提供了这一处境,用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话说,加缪写作了一种关于“极端处境的文学”(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305)。《局外人》广泛描写了生活的荒诞,比如机械的生活、琐屑的人生、看似激昂实则空洞的审判等等。“荒诞”深入《局外人》中外部世界的每一个局部,涉及小说每一处细节:

我在赛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我已经开始进餐,这时进来一个古怪的矮小女人,问我是否可以坐在我桌边。当然,她可以这么做。她的动作急促,两只眼睛在苹果般的小脸上闪闪发光。她脱下外套,入座并焦躁地查问菜谱。她招呼赛莱斯特,当即以精确而迫切的语气点完所有她要的饭菜。等待冷盘的时候,她打开提包,拿出一小片纸和一支铅笔,预先算好饭钱,拿出钱包,外加小费,把精确的总数全都放在面前。正在这时,冷盘送到,她飞快地狼吞虎咽起来。等待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提供本星期广播节目信息的杂志。怀着高度的细心,她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把所有节目全都勾画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纸,她整顿饭都在细致地做这件工作。我吃完时她还在无比专注地勾画着。接着她站起身,同样用机器人般精确的动作穿上外套然后离去[……]我觉得她挺古怪,但很快就把她忘了。(OCI 166)

加缪以一种直接而客观的语气描写出了这个“古怪的矮小女人”生存的空洞与机械。她焦躁的动作全是由习惯控制的机械行为,掩饰着灵魂的苍白空虚。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世人同样散发出非人的气息。在某些清醒的时

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无意义的手势,使周围的一切也因此变得愚蠢”(OC 229)。因此这个女人是荒诞的,但与此同时,她亦是寻常的,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正常人”,是《局外人》世界中默尔索之外几乎每一个人的缩影,而默尔索却先后两次指出,她“古怪”(Bizarre)。默尔索的“荒诞意识”使他发现了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与之保持距离。他主动脱离了这个群体,在冷眼旁观中全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概念,从而冲破了它们的束缚。人已经在无意中遭到社会彻底的规训,而默尔索恰恰发现了这一规训的存在:世人在母亲的葬礼上出于规范一定要哭泣,至少要表现出哭的样子,这在默尔索看来是荒诞的,他拒绝这样的形式。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默尔索的“荒诞意识”产生了第一个结果:清醒。在他主动脱离这一世界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积极性。但伴随着这一清醒也立刻产生了第二个结果:虚无。默尔索对生活的态度是怎么都行,他的口头禅是“这对我没有区别”。就像小说里所写,“我回答说人永远不能改变生活,任何事情的價值都一样,此间的生活并不让我厌倦”(OCI 165)。这就使得默尔索在以其积极性脱离了这个看似正常的荒诞世界之后,又开始变得消极,开始满足于这一距离感,并因此导致生命力的停滞,于是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混沌。他看到了生活的荒诞,继而认为,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一切看似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并没有意义,因此无需试图使它们显得有意义;同时改变也无任何意义,因为一切都是荒诞的,重要的是把这些虚假的东西统统打碎并与它们保持距离。因此,默尔索“局外人”的生存状态,其实是“荒诞意识”所造成的结果,是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的混合体。这也正是默尔索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耐人寻味之处。最能表现这一点的便是他对爱情的态度:

晚上,玛丽来找我并问我是否愿意娶她。我说这对我没有区别,如果她想,那我们可以结婚。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就像前一次一样,我回答说这毫无意义,也许我并不爱她。“那么为什么娶我?”她说。我对她解释说这毫不重要,如果她希望,那我们能结婚。另

外,是她提出了这件事,而我仅限于说可以。她觉得结婚是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片刻,默默地注视着我。接着她继续说话。她仅仅想知道我是否会接受另一个女人同样的提议,如果我和她有和玛丽相同的关系。我说“自然。”(OCI 165)

默尔索的名言“这对我没有区别”也被他用在了爱情上。默尔索漠然面对的爱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爱情”这个被大众无数次使用过的概念。萨特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评价:“默尔索与众不同地思考和行动:他不想认识这些持续的、千篇一律的伟大感情;对他来说爱情不存在,恋爱关系也不存在。只有当下、具体的东西才有价值”(Sartre, “Explication” 100)。“婚姻”“爱情”这些在正常人被滥用的词汇在默尔索看来早已空洞化,其实仅仅是一种常规。所以默尔索认为它们没有意义,也便不值得认真对待。出于强烈的主观抗拒,每当他谈论“婚姻”与“爱情”这些普遍概念时,他便表现出彻底的冷淡。惟有与肉身紧密相连的东西才能让默尔索感到实实在在的价值。但是,当默尔索对“爱情”的常规概念表达厌弃之时,他却同时放弃了“爱情”真正的情感核心。小说中写道,“例如,我因为对女人的欲念而备受折磨。这很自然,我还年轻。我从未格外想起玛丽。但我却如此想女人,任何女人,所有我过去认识的女人,想到我与她们相爱的各种场合,想来想去,牢房里布满了女人的面孔,充斥着欲望”(OCI 185-86)。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独特具体的情感消失了,只剩下简单化的肉欲,玛丽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人。默尔索他不仅解构了“爱情”中包含的社会常规,也同时放弃了“爱情”中人与人的真情实感。他的世界只剩下肉体,这导致了精神空间的坍塌。所以,当默尔索面对玛丽时,他却始终无法有效地表达他的情感,即使玛丽去探监时,默尔索也只能在她面前语焉不详地期期艾艾。“我发现她非常美,但我不知道怎样和她说”(OCI 183)。这恰恰说明默尔索在完成对日常观念的消解之后无法重新塑造生活,他的冷漠因此导致虚无。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说,“他(默尔索)内心深处的感觉方式,其实是拒绝感觉;他的感觉方式在任何

可表达的感觉方式之外,并促使他拒绝接受不纯粹的、虚假的、与社会习惯及日常生活相一致的形式”(Blanchot 251)。默尔索已经对旧事物产生了怀疑,却又尚未发现替代性的新事物,他身处两难境地之中,最终只能停留在空洞之中。他的“拒绝感觉”导致他无法重新与生活建立切实的联系。他是尼采笔下批判一切的“狮子”,却断绝了通往“婴儿”的途径。

在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之间,后者占据了统治性的优势。当默尔索远离荒诞世界之后,他在重新接近世界时感到了一种困难,而他并不愿意努力解决问题。默尔索的生命因此停留在了破坏之后的荒原状态,他也并没有强烈的生命意志使自己重新生长。在他身上,虚无最终占据了上风,甚至可以说,虚无始终占据着上风。默尔索缺乏强劲鲜明的生命动力,导致他在虚无中静止。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也因此被笼罩在一种冰冷的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为“白色书写”(Barthes 59)的文字风格之中。默尔索的“荒诞意识”最终导向了虚无,未能化作主动出击的行为,他与世界之间微弱的联系未能得到强化,却在不断放弃时逐渐形成一条深沟。他试图抗拒并逃避荒诞,却最终在“荒诞意识”的破坏性与批判性引导下走向了无根的虚无状态。他成了他自身“荒诞意识”的牺牲品,最终丧失了生活的动力。

与《局外人》几乎同时构思的《卡利古拉》,则从另一个角度探索了“荒诞意识”的危险。卡利古拉的个性与默尔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毫不做作地活着并死去,但他们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区别。加缪在第一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埃利孔: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转过头,平淡的语调):人必有一死而且他们并不幸福。

埃利孔(停顿片刻):算了,卡伊乌斯,这个真相大伙都处理得很好。看看你周围吧。妨碍他们吃午饭的并不是这件事。

卡利古拉(突然爆发):那么,所有的一切,围绕我的一切,全是谎言,而我,我要人们生活在真相中!恰好,我有让他们生活在真相中的手段。因为我知道

他们缺少什么,埃利孔。他们被剥夺了认识能力,他们缺少一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老师。(OCI 332)

卡利古拉无疑对生活保持着强烈的激情。用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的话说,“自从荒诞性被承认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比一切更令人痛彻心扉的激情”(OCI 234)。卡利古拉的激情中同样包含着他的痛彻,所以他强烈地要求行动,他无法安于现状,感到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寻求改变。在他的这份痛彻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其中最初潜藏的爱意。卡利古拉日后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皆出于这一生活真相“人必有一死而且他们并不幸福”。而这一命题,在卡利古拉看来是荒诞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在他看来也是荒诞的,人并非生而不幸,他要起而抗争,扭转这一生存处境。如果人必有一死的事实无法改变,那么卡利古拉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境况,然后逼迫他们重新展开对幸福的追求。卡利古拉的心中充满热量,他的每一句呼喊,都结实实地喊出了他心中的情感。因此,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介入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在他的思想深处,他甚至想为别人减轻痛苦甚至消除死亡,想为他人谋求幸福和正义。这就是为何在第一幕中西皮翁会说,“他经常说令人受苦是自我欺骗的唯一方式。他想做一个公正的人”(OCI 334)。西皮翁所描绘的这一曾经的卡利古拉,在看似不经意间再次点出了卡利古拉的出发点。就像卡利古拉所说“如果我不能改变事物的秩序,如果我不能让太阳从东边沉落,不能减轻痛苦,不能使人免于死,我这只结实的手掌对我有什么用,我这惊人的权力有什么用?不,卡索尼娅,如果我对这个世界的秩序不闻不问,那么我熟睡还是保持清醒便毫无区别了”(OCI 338)。卡利古拉不能忍受自己对生活的放弃态度,他绝不认同默尔索的那句“这对我没有区别”,他感到熟睡与警醒、行动与不行动之间有着最根深蒂固的差异。他无法安于默尔索式的冷漠,他对此感到彻骨的悲愤。所以卡利古拉虽然和默尔索一样拥有“荒诞意识”,他走向的却不是默尔索的虚无主义,相反,他认为自己作为唯一意识到荒诞存在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将这一启示强行交与所有人,“人们不理解命运,所以我将自己扮作命运”

(OCI 363)。但是,卡利古拉最终将所有人以及他自己统统引向死亡,其中的原因也恰恰隐含在他的出发点中:卡利古拉试图把自己以无常命运的姿态现身逼迫他人睁开双眼,以此使他人获得他所拥有的“荒诞意识”。他认定自己的逻辑正确,必须将自己扮作命运般无常而荒诞的力量方可使沉睡的人惊醒,然后他们才有可能认清各自生存的现状,重新起身寻找生命的真实。加缪在第三幕中写道,“逻辑,卡利古拉,必须遵循逻辑。掌权到底,弃权到底。不,我们不会回头,必须走到终点”(OCI 367)!卡利古拉的逻辑似乎是圆满的,但他忽略了形式逻辑与真实生命之间的距离。他在这个看似自洽的逻辑中愈行愈远,却不知道这个逻辑从一开始、从根本上便已经错了。用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话说,“当激情变得奴性时恶便诞生了,这种激情成为对一种合法强权的服务,在运用时只能变得冷酷”(Bataille 248)。卡利古拉以为他惊人的权力足以抵达神的领域,彻底地、一次性地给予人类的生活以答案,而无需顾及他人。他的激情脱离了人性,他在对幸福的追索中,忘记了最初那份蕴含其中的对人类的爱意。于是,恰恰是从开端处痛彻心扉的激情中,诞生出日后卡利古拉对他人的每一次侮辱、贬斥与戕害。这便更深刻地揭示出他身上所包含的巨大矛盾,揭示出他生命中的惊人困境。卡利古拉被“荒诞意识”引入歧途,他的行动超越了正义的限度,最终反噬自己,成为“恶”的化身。加缪日后在《反抗者》中写道,“在为压迫确立了一个限度之后,在这一限度之内所有人都开始得以拥有共同的尊严,反抗由此定义了它的第一个价值[……]在荒诞的层面,杀人只引起逻辑矛盾;而在反抗的层面,它是撕心裂肺的痛苦”(OCI 301-02)。卡利古拉在以逻辑之名杀人时对他人的生死显得无动于衷,他只是一个拥有“荒诞意识”的人而非加缪眼中真正的反抗者。他的过度行为最终毁灭了自己,他中了逻辑的圈套,用冰冷的逻辑替换了鲜活的生命。但如果说默尔索的冷淡让人感到悲伤,卡利古拉的痛彻却充满悲壮,因为他毕竟不计后果地追求过梦想,并最终承担了代价。我们无法忘记他死前面对镜中自我的一段独白:

如果我拥有月亮,如果爱情足矣,一

切都将改变。但在哪里才能平息这份干渴?哪一颗心灵,哪一个神灵能成为我的一泓深泊?无论这个世界上还是其他地方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我匹配。但是我知道,而且你也知道(他哭泣着将手伸向镜面),只需要让不可能的事实现。不可能之事!我寻找它们直至世界尽头,直至我自身的极限。我曾伸出双手,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总是你在我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上本应走上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不是好的那种。埃利孔!埃利孔!杳无音讯,还是杳无音讯。啊,今夜何其沉重!埃利孔不会回来了:我们永远有罪。今夜沉重得仿佛人类的痛苦。(OCI 387-88)

卡利古拉是火热的,即使在这全剧的结尾、在他下达无数毁灭人心的命令之后,尽管他的痛苦并非来源于被他杀死的人,而是来自他自己。他没有达到自己内心对自我的期待,最终遭遇了彻底的溃败。卡利古拉面对着镜中的自己并与自我对话,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化身和倒影,同时也是他生命中的荒诞,此时此刻他喊出了这句话:“我对你恨之入骨”。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中了圈套,从此再无挽回之机。“今夜何其沉重[……]沉重得仿佛人类的痛苦”(OCI 387-88)。何其惨烈,又何其悲痛!在这段告白中,面对着他的痛恨或悔恨,我们无法低估卡利古拉的真诚。但他失败了,在被叛乱者杀死之前,他已经死于他的“荒诞意识”,甚至从他第一次遵循其逻辑,使用他身为帝王所拥有的无边自由时起,死亡就已经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一步步发生,并一步步使他走向最终的彻底毁灭。在他无限的自我膨胀中与世界分离,最终被他所意欲击败的荒诞淹没。

无论默尔索还是卡利古拉,面对荒诞,他们虽然都在起点处产生了“荒诞意识”,却没能跨出真正的一步,以至行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默尔索被“荒诞意识”牵引着走向了悲哀的虚无主义,丧失了奋进的意志。卡利古拉的“荒诞意识”使他变得疯狂,在冷酷的专制中愈行愈远。默尔索与卡利古拉的事例暗示,“荒诞意识”作为一种认识真实与揭示真实的途径,其中同时隐藏着恐怖的破坏力与毁灭性。在加缪死后留下的散文诗遗稿

《太阳之子》中保留着这样一段话:

朝阳中的冬日是冷淡的。在充满阳光的土地上,八月使色彩暗淡,但寒冷却闪耀光辉,天空因雪而蓝。黑色的夏日,金色的冬天,真正的力量拥有两副面孔。(OCIV 694)

“真正的力量拥有两副面孔”,从他年轻时写下《反与正》时起,这便是加缪贯穿一生的想法。“荒诞意识”也同样如此。它所带来的洞察有可能转变成对自我或他人生存的压迫甚至使人逐渐丧失生命意志,这便是这道真实之光的内在张力,也是加缪在《局外人》与《卡利古拉》中所要展现的内容。认识“荒诞”是有危险的。但不认识“荒诞”,人类便只能在虚渺的幸福中沉睡,这样的幸福不堪一击。“荒诞意识”从本质上是对虚伪与安逸的揭露,但在揭露之后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继续生活。答案尚需人类在实践中不断寻找。

“人间幸福”:重建生存根基

通过《局外人》与《卡利古拉》,加缪充分地指明了“荒诞意识”这一令人清醒的力量背后所蕴藏的危险。但正如萨特所说,加缪“绝不逆来顺受,而是对人类思想的界限产生反抗性的认知”(Sartre,“Explication”98)。经过这样一番双向的探索,加缪更加坚定地看到,在拥有“荒诞意识”这个出发点之后,需要做的,是反转默尔索的生活态度,并打破卡利古拉无情的逻辑,要重新从世界中发现温暖,然后以“人”的姿态在这个荒芜的世间生存下去。唯有此时,我们才能从“荒诞意识”这一具有“两副面孔”的双重力量中,发现它真正属于生命的那一面并战胜其背后的死神。就像他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那样,“在人与其生活的联系中,总有什么东西比世间的一切苦难更加强大”(OCI 224)。在《局外人》中,加缪已经为这种正向力量留下了生长空间:

我相信我睡着了,因为当我重新醒来时脸上浮动着满天星斗。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耳边。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双鬓感到凉爽。

这沉睡的夏夜中奇妙的平安,像潮水般涌入我的生命。此时此刻,长夜将尽,汽笛鸣响。它宣告向着一个从此与我无关的世界进发[……]仿佛这强烈的愤怒为我洗净了苦痛,排空了希望,面对这充满征兆与星光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心扉。我体验到它与我如此相似,如此亲如手足,我感到过去曾经幸福过,现在依然幸福。为了让一切结束,为了让我感到少一点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观众,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呐喊为我接风。(OCI 212-13)

这段抒情的文字风格一改《局外人》整篇的冷静,而这一文风的改变本身正代表着默尔索生命力的苏醒。此时此刻,当星光洒在脸上的时候,这个在其一生中都与世界无比疏远的“局外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到了幸福。在满天星斗下,在大地与海洋的气息中,默尔索深刻感到自己与世界隐秘的关联,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世界,他依旧在穿越他的生活与时代,不在其上,亦不在其外。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在这小说结局的最后瞬间,读者发现默尔索的生命力在悄然恢复,仿佛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心跳。只有死亡才能让世界真正与自我分离,而只要活着,即使在这临终时刻,他也依然能够体会自己与世界之间深沉的亲密。他的“荒诞意识”并未消失,但他此时已摆脱了虚无,并在与世界的相遇中迸发出更猛烈的情与爱意。加缪说过,“在我们最疯狂的年代,对这片天空的记忆从未与我分离。正是它使我免于绝望”(OCIII 613)。如果说默尔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收获了幸福,也同样是星光下的大地海洋完成了对他的拯救。尽管这样的体会姗姗来迟,尽管这样一场与世界的“婚礼”在一个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刻才得以举行,但毕竟为时未晚。默尔索这段最后的告白暗示着他对自己曾经生活态度的否决。他在这临终前的最后时刻,终于“第一次向这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心扉”,而在此之前,他的心灵却被封闭在他的虚无与静止之中。《局外人》无疑是悲剧性的,但也依然在结尾处透露出一线新声,这一行行对幸福的追忆与呼唤,将默尔索重新带入世界,让他重感与世界相连。萨特在1944年创作的剧本《密

室》中,将他人的目光演绎为自我的地狱,认为人将在为他人的目光而活时丧失自我。而加缪在这本出版于1942年的小说中,则把他人的观看视作一个人与他所生活的世界之间微小而重要的联系,视作一种自身存在的证明。默尔索希望别人在他死刑时“用仇恨的呐喊为我接风”,也就意味着对他人的期待,尽管这样的情感是反向的,却依然代表着一种接触世界的努力,哪怕是仇恨的呐喊,也胜过无动于衷。加缪在早年的随笔中早已反复强调过人与世界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达成这一和谐的第一步,便是让自我向着世界敞开。他在《婚礼》中写道,“不,重要的并不是我,亦非世界,而仅仅是由它抵达我的那份让爱意诞生的融洽与宁静”(OCI 110)。默尔索在他生命的终点,终于接近了加缪本人真正的生命态度。在漫长而冰凉的压抑之后,我们终于听到加缪本人温暖的声音在这个瞬间喷涌而出。“我感到过去曾经幸福过,现在仍然幸福”,《局外人》在这全文结尾处反转了全书冰冷的调性,一个与生活曾经无比疏离的人,在生命的终点处重新找到了人与世界之间“那份让爱意诞生的融洽与宁静”,尽管只有这结尾处的一瞬而已。加缪说过,“虚无主义不仅仅是绝望和否定,而且尤其是一种绝望和否定的意愿”(OCIII 109),默尔索这样一个长久地被绝望和否定的意愿所笼罩的人,正是加缪一直试图解救之人,也最终得到解救。默尔索即将走上刑场,小说也在此结束,而生命的启示才刚刚开始,期待读者在放下书卷后继续探索。

加缪在《局外人》中以近乎全篇的冷漠与结尾一瞬的温柔这样一种“反与正”的方式向人们表明:人类的生活中必须有一种正向力量为生存构建根基,仅有“荒诞意识”并不足够,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一个不存在上帝的荒诞世界上,面对伊万·卡拉马佐夫“人之何为”的追问,加缪回答说,人不应该像默尔索一样落入冷漠的处境,也不能像卡利古拉那样试图成为掌控无限权力的神。默尔索与卡利古拉虽曾以各自的方式对抗荒诞,他们却没有真正找到战胜荒诞的途径。默尔索对生命的放弃态度毫不可取,而卡利古拉对世界过度的欲望也同样将导致毁灭,他们在与荒诞的对抗中再次陷入了各自新的荒诞,彻底沉入生命的黑洞。默尔索与卡利古拉在产生“荒诞意识”后分别走向虚无和专制,使得他们成为加缪

思考中必须避免的生存状态。而面对“生者何为”的追问,加缪深知路在他方。而这条路,便隐藏在他早年未发表的试笔之作《死之幸福》之中。

根据法国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的注释,小说《死之幸福》的创作时间略早于《局外人》。主人公麦尔索(Mersault)与默尔索(Meursault)的拼写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麦尔索却并非默尔索的先行者,《死之幸福》也不是《局外人》的草稿。两部小说分别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并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麦尔索和默尔索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身边的世界感到不满和生疏,是他们所拥有的“荒诞意识”,但从这个共同的起点出发,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③麦尔索从不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区别,而是不间断地追寻获取幸福的方法,在地中海的阳光下享受生活的乐趣,在海边小屋中体会内心的安宁,走出了一条属于他的道路。“荒诞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成为一个开始,从认识荒诞,到冲破荒诞,既不走向虚无,也不走向专制,而是走向生命的真诚与幸福。《死之幸福》就如同这个题目本身所展现出的意义一样,如果生活确实让人如局外人般感到疏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的追寻,那么在他一生的终点,在他合上双眼的时刻,他将无所遗憾。虽然默尔索与卡利古拉在荒诞面前也曾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反击,但前者的冷漠与后者的狂暴却都没有真正产生温暖人心的价值,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途径,最终被荒诞吞没。而在《死之幸福》中,麦尔索却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在加缪的创作谱系中麦尔索先于默尔索与卡利古拉,却比他的后辈们走得更远,或者更准确地说,《死之幸福》是加缪的“正题”,《局外人》与《卡利古拉》则是他的“反题”,在这正与反之间,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加缪所真正追求的生存状态。《死之幸福》与日后的《局外人》一样随着主人公的临终而结束,但其中散发的光彩与《局外人》的结尾大不相同:

清晨显现,满是飞鸟清风。太阳急速上升,从地平线下一跃而起。大地覆满金色与暖意。清晨中天空和大海从跳动的巨大光斑中飞溅出金黄湛蓝的辉光。一阵轻风拂过,从窗间送来海盐味的微风,让麦尔索的双手感到清凉。正

午时风停了,白昼如一颗成熟的水果般绽开,向着世界四方流淌它沉甸甸的温热汁水,伴随着一片骤然响起的蝉鸣。海面覆盖着这如油彩般金色的果汁,大海向被阳光压垮的土地再次送去一阵火热的气息,将它开启,任其升腾苦艾草、迷迭香与温热石块的香氛。躺在床上,麦尔索察觉到这碰撞与奉献,他向着起伏的无垠大海睁开双眼,水光耀眼,遍布海神的微笑。他猛然瞥见自己靠在床上,瞥见露西安娜的脸近在咫尺。他感到仿佛一颗碎石缓缓在体内升起,从腹部一直升到喉咙。他的呼吸愈发急促,间隙愈发短暂。那东西始终在上升。他看看露西安娜。他笑了,不带一丝抽搐,笑容同样发自内心。他翻倒在床上,感到体内依然有东西在缓慢上升,他看到露西安娜饱满的嘴唇,还有她身后那大地的微笑。他以同一道目光注视着她们,饱含同一份欲望。

“一分钟内,一秒钟内。”他想。上升停止了。如同石堆中的一颗石子,他面对这不变世界的真相重获内心的喜悦。(OCI 1196)

在这麦尔索病重临终气若游丝的最后时刻,在这“世界最初的清晨”中,他“面对这不变世界的真相重获心灵的喜悦”(OCI 582-83)。麦尔索在临终时所感受到的幸福,是一种完满,他感到自己未曾虚度光阴,他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获得的每一点微小而切实的满足,都在这临终时刻有如泉水般汇聚成一片汪洋,甚至在死前的刹那,他依然对露西安娜的身体与她身后的人间大地满怀爱欲,沉浸在当下汹涌的幸福与欢乐海潮之中。而对于默尔索,唯有当他深切地感受到他死前那一瞬间的幸福,他才能明白自己曾经也幸福过,幸福感向着往昔延伸,点亮了他晦暗的过去。默尔索在追溯,而麦尔索却是顺成。麦尔索无悔地死去。他战胜了生活的荒诞,重塑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他没有遗憾,也不必再有期待。既堪称早已胜利,亦可谓永远败亡,这是生命中最壮丽的悲痛,却也同时成为最深沉的幸福。这便是“死之幸福”这几个字真正的力量所在。死亡本身,已经谈不上

幸或不幸,惟有死亡之前的生命,方可为一切染上恢宏的色彩。这也正是加缪日后在《西西弗斯神话》的结尾处所要表达的情感“朝向峰顶的奋进本身足以充实人类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OCI 304)。麦尔索,便是荒诞世界中的西西弗斯,无论遭遇何种挫折与艰辛,他都再一次向着幸福迈进,同时也从未忘记自己所拥有的“荒诞意识”,始终在肩上扛住“荒诞”的巨石。当他踏上征途时,便已预先将死亡放置在路的尽头,于是当他如愿走完全程,他所拥抱的,便不再是简单的成败生死,他在征途中所散放出的惊人璀璨的生命热力,无法以任何寻常的目光计量。生命之火,也正是这样以其全部的勇力抵抗着荒诞。就像加缪所说,西西弗斯“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OCI 302)。这是西西弗斯下山的瞬间,在这个时刻他没有巨石可推,却无比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知道自己将再次推动巨石,并勇于承担一切。西西弗斯的“荒诞意识”赋予他支配命运的力量,并因此彰显了他的生命意志。麦尔索如西西弗斯般将荒诞背负了起来,英勇地面对它的挑战。于是,一个幸福的反抗者形象跃然纸上。对加缪而言,死亡、苦难与黑暗是一个人在生命中必须面对的事物,绝非生活最终的目标。在默尔索、卡利古拉与麦尔索之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日后加缪将要选择的道路,那条“反抗之路”。

加缪最终出于艺术考虑放弃了这部手稿。^④但在《死之幸福》中,包含着许多对加缪本人而言珍贵的精神线索,包含着他在其后的一生中始终不变的对生命的渴望。默尔索说“我感到过去曾经幸福过,现在依然幸福。”而麦尔索则可以说“我始终生活幸福”,无论他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幸福”一词,对麦尔索来说因此拥有了更厚重的意义。麦尔索在阳光中所感受到的坚定,他对这个“不变世界的真相”执着的追寻,以及在艰难而漫长的追求后所收获的喜悦,默尔索未能够拥有。与之相比,默尔索只能说死在了“世界最后的夜晚”中。加缪为这一对“兄弟”安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与求生方式,一个求索,一个放任。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将荒诞称为“人与其生活、演员与其背景的分离”(OCI 223),当他这么定义时,便已经隐隐地想到了对抗荒诞的

途径:在分离之后,再一次把世界与人的距离拉近。人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了荒诞,使人产生痛彻心扉的“荒诞意识”,这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正视的命运,更是每一个勇者必须承担的痛苦;而如果他们真正热爱生命,便会坚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以毫不逃避的态度勇敢地反抗“荒诞”。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在刺痛之后依然选择拥抱,需要更多的勇气与毅力。而这再一次的拥抱,也会糅进更多的睿智与洞察。

默尔索没有彻底失败,他毕竟在生命的终点隐隐感到了爱的可能。而麦尔索的存在,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实现这一生命之爱的途径。加缪说,“洞察力恢复了,且变得愈加审慎,荒诞意识也因此在其中显得愈加清晰明确”(OCI 233),拥有“荒诞意识”,我们才能有机会和麦尔索一样寻得一条最终穿越“荒诞”的道路,尽管我们同样有可能像默尔索或卡利古拉那样死于途中。“荒诞意识”让加缪懂得幸福与苦难并存,让加缪懂得“荒诞意识”本身也蕴含着生存与毁灭的双重力量。而他在既没有选择蒙上双眼,也没有自暴自弃、肆意妄为,他保持着这份“荒诞意识”,并尝试战胜其中的危险。在他冷静而锐利的目光中,始终保留着他对人生万物坚定的热情,蕴含着他对人间大地深沉的挚爱。面对“生者何为”的问题,加缪试图以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做出回答。生与死,幸福与苦难,阳光与阴影都无法分开,对它们必须拥有二位一体的彻悟,才能真正理解生,理解温暖,理解幸福。加缪以一个无比坚定的身姿与一颗无比火热的心灵,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迎风矗立。在生与死的碰撞与对决中,在光与影的交织与对立中,在“对延续的欲望和对必死命运的双重意识”(OCI 134)中,加缪看见了把人类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找到了从“荒诞意识”中引出的那条唯一正确的生命之路。在此之后,无论时代与生活变得如何黑暗疯狂,他也依然坚守着这条路,寻觅着人间的幸福。黑暗并非尽头,还需继续深入,直到在荒诞的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生活态度,在上帝死去之后重获人之为人之尊严。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加缪为“反抗系列”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为他之后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Notes]

① 本文所引全部加缪文句皆出自法国伽利马出版社2006

至2008年新版四卷本七星文库《加缪全集》: Albert Camus. *Œuvres Complètes*. vols. 4. édition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line Lévi-Valensi, avec, pour ce volume, la collaboration de Raymond Gay-Crosier et d'André Abbou, Zedjiga Abdelkrim, Marie-Louise Audin, Samantha Novello, Pierre-Louis Rey, Philippe Vanney, David H. Walker et Maurice Weyembergh,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6-08. 引用参照法国学术通例标注卷数与页数(OCI 795)即全集第一卷795页,下同。文中所有引文皆系本文作者由原文自译。

② 对加缪本人而言,他本人的“荒诞意识”除了产生于他身为作家所拥有的敏锐与洞察以及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外,也与他从小赤贫的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有关。比如1930至31年间在一场几乎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比如1934至35年他与第一任夫人西蒙娜失败的婚姻,比如他在求学期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马尔罗等作家细致的阅读与思考以及他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行业期间对社会惨烈现状的充分认知等等。

③ 例如,他们都曾杀人,但麦尔索之所以在他的朋友扎戈勒斯苦苦劝说下帮助后者结束人生,是因为扎戈勒斯双腿瘫痪受困家中,难以继续享受生活的乐趣,他深陷于无力与孤寂难以自拔,于是想以一种尊严的方式死去,并让他的朋友用他的遗产去追寻梦想。最终麦尔索在无数次内心交锋与朋友的多次规劝后完成了扎戈勒斯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麦尔索在枪杀扎戈勒斯之后,携着对方的心愿一同活了下去。这都与《局外人》中的气氛全然相反。

④ 加缪生前没有发表《死之幸福》,这部作品现收录于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遗稿部分。根据其笔记与书写中的相关记录,这一方面是因为加缪感到其中艺术性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年轻的加缪感到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力不从心,所以最终放弃了该文稿的出版。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Barthes, Roland. "Écriture et révolution,"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Paris: Seuil, 1953 et 1972.
- Bataille, Georges. "La morale du malheur: La Peste." *Œuvres complètes XI*. Paris: Gallimard, 1988.
- Blanchot, Maurice. "Le roman de l'Étranger." *Faux pas*. Paris: Gallimard, 1971.
- Grenier, Roger. *Albert Camus Soleil et ombre*. 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Folio, 1987.
- Sartre, Jean-Paul. "Explication de L'Étranger." *Critiques littéraires*. Paris: Gallimard, Folio essais, 1947.
- .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Folio essais, 1948.

(责任编辑:王嘉军)